

# 二十世紀 中國精英文化的花果飄零

• 唐小兵

去年7月在中國的西陲邊地雲南騰衝參觀紀念遠征軍的國殤墓園時，畢業於雲南一所大學的男導遊講起一些倖存的遠征軍在1950年代後的人生坎坷與悲劇命運，尤其是子女因為父輩這個身份而避之唯恐不及，甚至以非人道的方式對待他們等種種境況時，大有拍案而起慷慨激昂之態，聞者也幾乎墮淚。在中國人的抗戰後期，遠征軍這一頁歷史何其悲壯，在所謂「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歷史悲歌中，也有着穆旦、黃仁宇等投筆從戎的灼灼知識青年的身影。同行者有王元化先生的弟子胡曉明教授，他是研究中國古典文學與江南文化的名家，也是一位詩情橫溢、至情至性之人。

在我們應學校工會組織的暑期療養團團長之約，聯合舉辦了一場有關抗戰時期中國精英文化的南遷及其影響（主要是關於西南聯合大學的故事）的沙龍之後，胡曉明意味深長地提及，多年前他曾經在台灣一個文化沙龍見到為二十世紀中國抗戰史，尤其是抗戰中教育史和文化史留下重要見證的從台灣大學外文系退休的齊邦媛教授；在聽過齊講述其回憶錄《巨

流河》書裏書外的故事與感慨後，胡問道：為甚麼中國的人文主義傳統與精英文化在國難當頭、山河破碎的八年抗戰中，仍舊能夠薪火相傳、沛然莫之能禦，以至於產生了現代中國大學史上最重要的傳奇之一——西南聯大師生群體的群星閃耀，而在戰後的短短幾年，知識份子群體竟然就崩離析、士氣萎靡，與此相關聯的精英文化也日薄西山乃至於煙消雲散，如一地散碎的人文主義珍珠再也無法連綴貫穿起來？胡沒有講述齊如何回應這個大哉問，而這個問題卻長久地糾纏着我，讓我在讀書思考和教學的間隙中時常想起這個從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文化的深處浮現出來的經典之問。

## 一 文化比政治更有尊嚴

無獨有偶，多年前在課上引領年輕的大學生細讀何兆武先生膾炙人口的回憶西南聯大學生生活的口述史《上學記》，他們都為之傾倒，甚至有一些學生夢想着能夠找到月光寶盒，穿越回到那個弦歌不輟的時期，去感受那個年代的大學生活，體驗

在戰火紛飛中跑警報、泡茶館，讀書求學的緊張與從容，感受那個時代的人文主義大師的光采與教誨。何自然沒有迴避美國歷史學家易社強(John Israel)在《戰爭與革命中的西南聯大》(*Lianda: A Chinese University in War and Revolution*)中所發掘的種種戰時苦難與艱辛，但他同樣講述了即使在如此一個充滿不確定感和動盪感的戰爭年代，在昆明的西南聯大校園內外，他和他的同輩們那種朝氣蓬勃的生命力和對未來的確定的希望感，這既是一種在自由多元教育下所形成的對於個體人生的展望與自主，同時也是將自己的人生與家國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形成一個勇往直前的情感和意志共同體。

1939到1946年在西南聯大度過大學和研究生七年時光的何兆武認為，那是他人生至今最幸福的一段時光，無問西東的歲月，同時也確實是烽煙瀰漫、炮火連天的時期。他在書中如此闡述他那一代青年人所理解的幸福：「我想，幸福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你必須覺得個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朧，並不一定是甚麼明確的目標，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前景，也必須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會整體在腐敗下去，個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這兩個條件在我上學的時候恰好同時都有，當時正是戰爭年代，但正因為打仗，所以好像直覺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認為，戰爭一定會勝利，勝利以後一定會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過上非常美好的生活。那時候不只我一個人，我相信絕大多數青年都有這種模糊的感覺。」<sup>①</sup>我想，這就是人文主義文化所能給予青年人的一種精神力量吧，人文主義在黑暗時代尤其能

夠如薪火相傳般展現其格外動人的精神力量。

1964年，復旦大學蔣天樞(字秉南)教授特地南下廣州去拜訪舊時清華大學恩師陳寅恪，陳為其赤誠所感動，將身後文集的刊印事都託付於蔣，並寫下與早年紀念王國維碑詞交相輝映的帶有遺囑性質的〈贈蔣秉南序〉，如今讀來仍舊振聾發聵：「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蹤昔賢，幽居疏屬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遺範，託未契於後生者，則有如方丈蓬萊，渺不可即，徒寄之夢寐，存乎遐想而已。嗚呼！此豈寅恪少時所自待及異日他人所望於寅恪者哉？雖然，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sup>②</sup>

## 二 群星閃耀的哈佛中國留學生之謎

轉眼間一年過去了，又是暑熱沸騰瀰漫、疫情未曾消歇的暑假，整個7月我都「宅」在家中讀書寫作，終於一口氣讀完《余英時回憶錄》；因為上學期教課的原因，又重新閱讀了齊邦媛的《巨流河》，種種有關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與文化的記憶紛至沓來，如翻捲奔湧的前浪不斷衝擊着我的心靈世界。余英時先生在回憶錄的最後部分談及中國人文學者在哈佛大學的歷史發展，提出了一個意味深長的、正好可與胡曉明之間互為參照的問題。他指出，中國留學生在哈佛的歷史發展中曾經有兩個群星璀璨的時期，一